

# 科尔内“人口经济”模型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李通屏 刘星彦

**摘要**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是实现今后目标的关键,也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考虑人口的影响。科尔内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阶段依存关系的理论模型,对于深刻认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以及寻找这一转变实现的根本途径,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科尔内模型的基本内容,科尔内模型的意义及局限性,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的人口环境及应具备的人口条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科尔内的理论模型对中国经济方式转变的启示,提出了转变的对策建议。

**作者** 李通屏,1963年生,1990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获硕士学位。现为郑州大学商学院人口研究中心讲师。(河南郑州 450052)

刘星彦,女,1965年生,1987年毕业于河南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现为郑州教育学院经济学教研室讲师。(河南郑州 450052)

亚诺什·科尔内(János Kornai)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阶段依存关系的理论模型(简称科尔内模型),揭示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方式依存关系的规律。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人口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研究这一理论模型,对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意义十分重大。

## 一、科尔内模型的基本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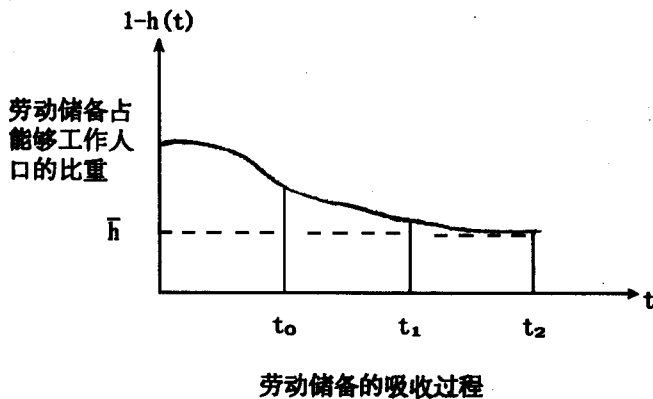
### 1.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时期或经济增长方式的表述

科尔内把经济增长时期表述为或同意表述为经济增长的粗放时期和集约时期,也作过“外延发展阶段”与“内涵发展阶段”的划分。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献中,经常使用下列表述方式:经济增长已从粗放时期转入集约时期”。<sup>[1]</sup>在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动态模型进行分析时,他主要采用了“外延发展时期”与“内涵发展时期”的表述。<sup>[2]</sup>科尔内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专著《社会主义制度》中,曾经把苏东学者使用的概念与西方经济学家使用的概念相比较。指出“‘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这种区分以及相伴随的专门术语,在西方作者中广为流行。但是社会主义各国的作者却愿意采用另一对专门术语,即‘粗放(外延)’方式和‘集约(内涵)’方式来加以表述。这两对用语在语义上是相同的;要素增加等于外延,要素生产率提高则与内涵相当。”<sup>[3]</sup>

### 2. 关于经济增长不同时期在人口与劳动就业特征方面的理论

第一,经济增长的粗放时期,生产的扩大是通过就业的广泛增加而推进的;在经济增长的集约时期,必须

\* 河南大学胡学勤教授为本文提出了重要意见,特表感谢。



劳动储备的吸收过程

劳动市场成了资源约束型的,劳动储备的吸收达到了容忍限度  $\bar{h}$ 。集约时期符合这一特征,更符合  $t_2$  以后的时期。 $[t_0, t_1]$  时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子系统之一的劳动市场是需求约束型的,而其他子系统是资源约束型的,这样,潜在的劳动储备将被吸收。这里的主要动力是扩张冲动和紧密相关的几乎不可满足的投资饥渴。如果系统中的其他市场或分配子系统,一直是需求约束型的话,“纯粹”的需求约束型劳动市场会固定在这种状态,成为长期的、持久的、正常的状态。

第三,外延发展阶段的特征是:由于长期短缺,产品市场是“卖方市场”,而由于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储备,劳动力市场却是“买方市场”。<sup>[4]</sup>而在内涵发展时期,不仅商品和资本市场存在短缺,而且劳动力市场也存在短缺,<sup>[5]</sup>劳动力短缺变为长期现象是内涵发展阶段最重要的性质。

第四,外延发展时期就业人数受劳动力需求决定,而内涵发展时期就业人数取决于供给一方。

(1) 决定外延发展时期的就业关系式:

$$\rho^* \Phi = \Lambda_D^* = \Lambda_N^* \quad (1)$$

式中  $\rho^*$  ——经济系统的一般增长因子  $\Lambda_D^*$  ——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因子  
 $\Phi$  ——产生就业机会的增长因子  $\Lambda_N^*$  ——就业人数的增长因子

外延发展时期劳动市场是需求约束型的,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储备,即使在周期的最高点也有不被吸收的大量的长期失业。乘积  $\rho^* \Phi$  决定了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因子  $\Lambda_D^*$ 。由于有充分的劳动力储备,劳动力需求能够得到满足,所以就业人数按劳动力需求相同的速度增加。

$$N(t) = LD(t) \quad (2)$$

式中  $N(t)$  ——t 年的实际就业人数  $LD(t)$  ——t 年对劳动力的需求

公式(1)反映的就业人数与劳动力需求在增长速度方面的关系;而公式(2)则反映就业总量与劳动力需求总量的关系,就业人数由劳动力需求决定。

(2) 决定内涵发展时期的就业关系式:

劳动力供给方程 
$$L_S(t) = L_{S,1} \Lambda_{S,1}^t \quad (3)$$

式中  $L_S(t)$  ——t 年的劳动力供给  $L_{S,1}$  ——内涵发展阶段初始年份的劳动力供给  
 $\Lambda_{S,1}^t$  ——内涵发展阶段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因子,它可能小于 1,也可能大于 1

内涵发展阶段是劳动力短缺成为普遍现象的阶段,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需求。或者说所有的劳动力供给都能被就业所吸收。根据短边规则,就业人数由供给和需求双方中最少的一方决定。因而就有方程式(4)。

$$N(t) = L_S(t) \quad (4)$$

该式表明,内涵发展阶段,就业人数由劳动力供给决定。

以每个雇佣劳动的更充分利用为基础。

第二,经济增长的粗放时期劳动市场是需求约束型的,经济增长的集约时期,劳动市场则符合资源约束型的特征。如左图:

图中,纵轴表示潜在劳动储备在能够工作的人口中所占的比重,用  $1-h(t)$  表示,横轴表示时间,用  $t$  表示。时间  $t_1$  之前的时期是潜在劳动储备被吸收进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过程,需求约束型劳动市场的正常状态在该时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这个时期是经济增长的粗放时期。接下来的历史时期  $[t_1, t_2]$  表示接近资源约束型劳动市场,在时间  $t_2$ , 纯粹状态完全建立,劳

$$\rho^* = \Lambda_{s,1} \Psi \quad (5)$$

式中  $\Lambda_{s,1}$ ——内涵发展阶段劳动供给的增长因子  $\Psi$ ——生产率的增长因子

该式表明,在内涵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由劳动力供给增长和生产率的增长共同决定。

### 3. 关于外延发展时期向内涵发展时期过渡所依存的人口(或劳动力)条件的理论模型

第一,为了保证外延发展时期是有限的,必须使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快于潜在活动人口的增长速度,或者快于适龄工作人口的增长速度。其模型如下:

$$\Lambda_D^* > \Lambda^{act*}$$

$$\Lambda_D^* > \Lambda^{dem*}$$

式中  $\Lambda_D^*$ ——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因子  $\Lambda^{act*}$ ——潜在活动人口的增长因子

$\Lambda^{dem*}$ ——适龄工作人口的增长因子

什么是潜在活动人口?科尔内说:“适龄工作人口的一部分,由于健康,家庭或其他社会原因而处于失业状态,而除此之外的全部适龄人口就叫做‘潜在活动人口’。换句话说,潜在活动人口的数量代表了劳动力供给的上限。各种外部原因可以使劳动力供给低于此数”,<sup>[6]</sup>即劳动力供给人数 $\leq$ 潜在活动人口的数量。

第二,外延发展时期的延续一方面依赖于人口增长,另一方面取决于扩张的速度和技术特性。

人口是劳动力的源泉,劳动力的增长是由前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所决定的。前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快,则该时期的劳动力增长速度也就越快,这样将进一步强化劳动力“买方市场”的特性,因此,通过就业的广泛增加以推进生产扩大就成为自然的选择,从而使经济增长的外延(粗放)特征更为浓厚。反之,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则使“买方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淡化,劳动力释放较慢,外延发展时期就会结束得更快一些。其次,外延发展(或粗放增长)时期的延续时间还同扩张的速度有重要关系,而扩张的速度与投资率的高低有关。如前图所示,“投资率对 $[t_0, t_1]$ 这段时期(类似于经济增长的粗放时期)的长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了较高的投资率,潜在劳动力储备吸收加快”,这样, $[t_0, t_1]$ 时期就会结束得更快一些。但科尔内也同时强调,“高投资率对该过程的完成并不是必要条件。因为在低增长率下,吸收也可发生”。<sup>[7]</sup>再次,技术特性(或工艺选择)在外延发展时期有两种对立的倾向存在。工程师、其他专家以及许多经济管理者和政治家对“现代技术”都有一种偏爱,这些技术通常资本密集程度较高而劳动密集程度较低。另一个相反的趋势是,既然投资资源是有限的,而可得到的劳动力是无限的,因而,在要求最快的扩张压力下,企业比较愿意选择劳动密集型的技术。 $[t_0, t_1]$ 时期的长短取决于在总的经济扩张中两种倾向是如何组合的,哪些部门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哪些技术类型占主导。如果劳动密集型部门扩张得较快,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被多数企业采用,整个经济达到潜在劳动储备完全吸收的过程就会更快。哪些部门、哪些技术处于优先发展的主要地位或次要地位,这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资源约束型体制下,技术特性对 $[t_0, t_1]$ 时期的长短便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社会主义体制,即可以在整体上说是资源约束型的体制,它肯定将达到这种状态,不管强调重工业,还是给农业以优先权”。<sup>[8]</sup>但总的说来,这种趋势是存在的。

## 二、科尔内理论模型在研究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科尔内既是匈牙利改革的见证人,又是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作为改革时代的经济学家,他注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同经济体制一样,经济增长也是他注视的重要问题。他立足于匈牙利和东欧,并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分析。既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又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目前,中国正在加快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科尔内的理论模型,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两个转变”,特别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颇具启发意义。第一,他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力图使用与阐述私有市场经济一般理论类似的方法,运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新材料,分析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以找出共同规律。第二,中国是一个占世界1/5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大战略问题。发展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必须高度重视人口问题。科尔内的理论模型体现了他对人口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作用的敏感。第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

在经济建设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科尔内的分析由于集中于国有企业,因而对我国仍有借鉴作用。

科尔内的理论模型对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意义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对它的历史局限性和适用条件我们必须注意。

第一,处于匈牙利改革时代的科尔内,他把分析的主题集中在“传统的”或“经典的”社会主义的一般模式。这种社会主义脱胎于旧社会,也就是紧随革命和国有化而来的早期风暴年代之后在市场取向的改革开始之前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类似于1978年以前的发展时期。第二,短缺经济,“短缺”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之一,经济体制是资源约束型体制。第三,分析高度集中于国营企业,而不论述其他的所有制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已不同于“传统的”或“经典的”社会主义的一般模式,而是改革、开放,并广泛运用市场机制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已摆脱了“短缺经济”的困扰,由“卖方市场”转向初步的“买方市场”。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格局形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制经济占主导,但非国有制经济异常活跃,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就业人数不取决于需求,更不由供给决定,一定数量的不充分就业和失业问题仍将存在,而东欧国家则恰恰相反。按人均生产衡量,中国还处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也低于东欧诸国,但在人口和地域方面,中国要大好多倍,同时还有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在分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对科氏理论决不能生搬硬套。

### 三、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分析

人口与经济辩证关系的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决定人口,人口反作用于经济,两者互为变量、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一定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对它的选择并不是任意的。人口与劳动力状况也是一定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基础条件。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是因为它们不仅具备了转变的自然条件、资源条件、市场条件和生产技术管理条件,也同时具备了转变的人口条件。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之所以是粗放型的,并不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端,而是因为他们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集约型增长方式所需要的条件,特别是人口条件。欧洲经济委员会地区不同成员国之间经济增长的变化,反映了经济增长对人口条件的依存关系,见表1:

表1 欧洲经济委员会地区人口增长与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年均增长率(%)			
		1965—1973	1974—1980	1981—1985	1974—1985
欧洲 市场 经济 国家	人口	0.7	0.4	0.4	0.4
	就业	0.3	0.2	-0.4	-0.1
	GDP	4.3	2.6	1.3	2.0
	就业贡献	0.3	0.2	-0.4	-0.1
	资本集约度	1.7	0.3	0.7	0.4
	全要素生产率	2.8	2.8	1.8	2.5
中央 计划 经济 国家	人口	0.9	0.8	0.8	0.8
	就业	0.9	0.7	0.4	0.6
	物质生产净值	7.1	4.6	3.1	4.0
	就业贡献	0.9	0.7	0.4	1.1
	资本集约度	2.6	1.5	0.4	1.1
	全要素生产率	3.6	2.4	2.3	2.3
北 美	人口	1.1	1.1	0.9	1.0
	就业	2.3	2.2	1.5	1.9
	GDP	3.8	2.3	2.4	2.3
	就业贡献	2.3	2.3	1.5	1.9
美	资本集约	0.6	0.1	1.2	0.5
	全要素生产率	1.4	0.4	0.4	0.5

资料来源:欧洲经济委员会.2000年全面经济展望.表B—3,5,8,10,13,17.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从表 1 可观察到:

1. 欧洲市场经济国家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在 1965—1985 年的 20 年间, 年均人口增长率较低, 就业增长率更低。前者各时期的人口增长率在 0.4~0.7% 之间, 劳动就业人数 1985 年也仅有 13920 万人, 20 年仅增加 300 万人, 20 年才增长 2.2%。后者的人口和就业的年均增长率也都在 1% 以下。而北美的人口增长和就业增长均处于较高水平, 就业增长率更高, 前者多在 1% 以上, 后者在 2% 左右。

2. 欧洲市场经济国家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全要素生产率对 GDP 和物质生产净值增长的贡献占绝对优势。1965—1973 年, 市场经济国家占 65% 以上,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占 50% 以上; 1974—1985 年, 前者已超过 100%, 后者也上升到近 60%, 80 年代并超过 70%。北美, 全要素生产率对 GDP 的贡献未能超过 50%。市场经济国家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GDP 和物质生产净值的增长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因而是集约型的增长方式, 北美 GDP 的增长对就业、资本的增加依赖度高, 而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依赖度较低, 因而属于相对粗放的增长方式。

3. 高人口增长率、就业增长率同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应; 低人口增长率, 就业增长率同较高的要素生产率相对应。也就是说, 高人口增长率、就业增长率对应的是相对粗放的经济增长, 而低人口增长率、就业增长率对应的是集约型的增长。

观察中国改革前后经济增长的变化, 仍可发现这一对应关系。请看表 2:

表 2 中国改革前后人口增长与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 (%)

时 期	人口增长率	国民收入增长率	资本投入 增长贡献	劳动投入 增长贡献	综合要素生产 率增长贡献
改革前		5.98	5.20	0.77	0.01
1953—1977	2.04	(100.00)	(86.96)	(12.88)	(0.16)
改革以来		8.91	5.49	0.86	2.56
1978—1989	1.43	(100.00)	(61.62)	(9.65)	(28.73)
	(1978—1990)				

资料来源: 沙吉才. 改革开放中的人口问题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26. 张军扩. 经济研究, 1991(4)

表中数据为年均增长率

表 2 说明, 改革前的我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 5.98%, 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高达 99% 以上, 而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仅 0.16%, 这是一种典型的外延粗放型的增长。而与此对应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2.04%。1978—1989 年, 我国经济增长对要素投入增长的依赖依然强劲, 但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 其贡献份额达 28.73%, 经济增长的粗放性质有所收敛。另一方面, 人口年均增长率较前下降 0.61 个百分点。这反映出,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增长率的下降, 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较为有利的人口环境。

进入 90 年代以来, 中国人口转变进入了关键阶段, 人口再生产接近现代型。从 1991 年开始, 中国人口出生率已持续降到 20‰ 以下, 进入世界低出生率国家的行列, 总和生育率也低至更替水平, 进入低生育率阶段。这就割断了外延粗放型的增长与人口增长的联系。但是, 我们还必须看到, 这种有利的人口环境仍然是初步的, 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的社会经济基础仍很脆弱, 增长率反弹随时都可能发生, 同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相比, 人口形势还非常严峻。

其一, 人口增长率同已实现转变的国家相比仍然偏高。

1995 年, 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到 10.55‰, 是建国以来最低的年份之一。而经济增长为集约方式的国家除北美洲外, 均为零增长或负增长。1992 年, 美国、加拿大均为 8‰, 日本仅为 3‰, 匈牙利 -2‰, 1994 年为 -3‰。<sup>[9]</sup>在人口低增长情况下, 近年我国年净增人口数仍在 1300 万人左右, 人口零增长的实现还要经过 40 年左右的时间, 人口总量在现有基础上还要增加近 4 亿人, 这就意味着, 外延粗放式增长对人口增长的依赖仍将较长时期的存在。另一方面, 人口结构正急剧老化。1995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已较 1990

年的5.6%上升0.8个百分点,几乎在我们进入21世纪的同时,我国人口也将进入老年型国家的行列。人口总量扩大、急剧的人口老龄化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招致消费需求的膨胀,<sup>[10]</sup>这在客观上将造成经济过快增长的压力。

其二,严峻的就业形势。

1995年底,中国从业人员总数为6.248亿人,比上年的6.147亿人增加0.101亿人,增长率1.64%。劳动年龄人口为7.38亿人,比上年增长0.1亿人,增长率为1.37%,从业人员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尽管如此,就业形势仍然是严峻的,距成熟的内涵发展阶段仍有相当距离。第一,劳动力过剩供给的状况依然严重。据测算,劳动力过剩数量在“九五”、“十五”期间都呈增长之势,由目前的1.45亿人增加到2000年的1.53亿人,2005年的1.64亿人。过剩率1995年为29.9%、2000年为29.5%,2005年为29.8%,2030年以后,中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才会根本扭转。<sup>[11]</sup>第二,隐性失业仍处在高位状态,1994年,总就业量为6.147亿人,其中有1.7006亿人处于隐性失业状态,隐性失业率高达27.7%,<sup>[12]</sup>我国城市处于停产、半停产企业中的在职失业人员连同公开失业人员已达1300万人,远远不是“以每个雇佣劳动更充分利用”为特征的集约增长。第三,就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和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来看,今后15年,尽管存在着 $\Lambda_D^* > \Lambda^{dem}$ 这一有利于结束外延发展阶段的条件,但两者仍极为接近。1996—2010年,劳动力需求的增长 $\Lambda_D^*$ 为20.5%,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 $\Lambda^{dem}$ 为15%。以上分析表明,为实现新的增长方式,创造优良的人口环境仍然任重道远。

#### 四、科尔内的理论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启示

启示之一: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取决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调节作用,取决于资源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的根本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资源约束型体制,它高度集中化,垂直等级管理结构,非价格信号起支配作用,而价格、货币和利润等经济杠杆的作用相当微弱,根据指令性计划进行控制。与这种体制关联的是短缺、软预算约束、投资饥渴、扩张冲动。这种体制下,企业生活在强制高速增长的气氛之中,人们普遍认为,唯一获胜的标准就是总增长率。“每一位地区的内阁成员,每一位部长,每位生产部门的领导人,每一位国有企业的经理,都想使自己的单位扩大”。<sup>[13]</sup>经济体制的每一个层次,从只有几个人的小组长到管辖几十万或几百万人的部长都有扩张冲动。这种体制下,过渡到新的条件和新的阶段,伴随着许多摩擦、起伏和痛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显然无从展开。推动我国经济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变,提高市场机制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关键在于加快改革开放。

启示之二:充分认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除了体制因素的根深蒂固外,中国还存在着人口等方面的约束。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小国截然不同,转变过程中会遇到其他国家难以想象的困难。人口增长仍在继续,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局面也将较长时期的存在,国内各区域之间发展又不平衡……。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特殊历程,不仅中国与外国有别,国内各区域之间也有各自的特征。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对转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要认真研究,找出妥善解决的办法。同时要注意照顾各区域之间的特点并注意转变的渐进性,分步实施,重点突破。

启示之三: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当作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来抓。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措施要得力、办法要多,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而要从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等的总体联系出发,立足现实,放眼未来,除了体制改革这一关键性因素外,还要注意人口条件的培育。为此,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第一,坚定不移地贯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人口过快增长同以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为特征的外延粗放增长相适应,是经济的粗放增长所依赖的重要条件,而与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为特征的内涵集约增长则背道而驰。第二,减少对劳动力的供给,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主要是低龄、低质量的劳动力供给,其主要措施是加大教育投入的力度,提高教育水平,加快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开发,先培训、后就业。这样既可以从整体上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总量,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劳动力队伍的整体素质。扩大劳动力需求的主要措施,一要靠适度的经济增长,二要注意选择合理的经济技术结构,继续开辟适合于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加快劳动储备的吸收,实现经济的集约增长。

启示之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注意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根据科尔内模型所揭示的规律:在需求约

束型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如果其他系统是资源约束型的,那么潜在劳动力储备肯定将达到完全吸收的状态。如果其他系统是需求约束型的,那么需求约束型劳动力市场将会固定下来,成为长期的、持久的状态。目前,我国经济已摆脱了短缺的困扰,买方市场已经形成,这客观上限制了劳动力需求的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由于黄金年龄结构所带来的生产年龄人口激增和劳动力率的提高,下个世纪上半叶,仍然是我国人力资源最丰富的时期,而人力资源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比较优势。因此,确定合理的失业率,有效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这不仅是需求约束型劳动力市场和需求约束型经济系统所提出的重要课题,而且也是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优势的必然选择。同时,劳动力市场是买方市场,这本身就表明,经济增长还没有走出外延发展阶段(或粗放发展时期)。以此考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就是缓解劳动力买方市场压力的过程、吸收劳动储备以及变人力资源优势为经济发展优势的过程。

#### 参考文献:

- 1 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上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268
- 2 亚诺什·科尔内.增长、短缺与效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 3 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11)
- 4 同2第65页
- 5 同1第4页
- 6 同2第125页
- 7,8 同1第266页、第267页
- 9 美国人口咨询局.世界人口数据表,1993、1995年
- 10 李通屏.论人口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经济问题,1997(2)
- 11 贾绍凤,孟向京.中国人口就业预测分析.中国人口科学,1996(6)
- 12 同10
- 13 亚诺什·科尔内.突进与和谐的增长.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3

(上接第43页)

#### (4)长期坚持节约用粮

按最低要求指标控制,未来浙江粮食并不十分丰裕;按理想要求指标控制,又有相当大的难度。所以,节俭度日,减少浪费,提倡粮食的高效利用,合理消费,将人均粮食消费量控制在适当的水平,是实现人口与粮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浙江应该把正确引导人们的消费观念,提倡节约用粮作为一个重要方针长期坚持。

#### (5)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

在所有对策措施中,最重要的是为资源保护与开发、加强科技进步和投入、控制人口和提倡节约等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和政策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耕地比以前有所减少、人口比以前有所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反而提高了。根本原因是农村的制度变了,人们的积极性提高了,粮食反而有所剩余。所以,实现21世纪上半叶人口与粮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对策还是“一靠科技、二靠政策”。

#### 参考文献:

- 1 邓聚龙.灰色预测与决策.武昌: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
- 2 姜忠军.GM(1,1)模型及其残差修正技术在土地承载力研究中的应用.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5(5)
- 3 尹文耀.人口发展多方案综合评价方法.统计研究,1996年增刊
- 4 浙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土地利用现状一级分类面积汇总表,内部资料,1996
- 5 杭州大学地理系.浙江省土地承载力研究报告.内部资料,1994
- 6 浙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编.浙江省农业综合发展规划研究.内部资料,1994
- 8 “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课题组.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 9 邬沧萍.转变中的中国人口发展总报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 10 浙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编.浙江省农业综合发展规划研究.内部资料,1994